

長安史蹟叢刊

◎主編 魏全瑞

# 類編長安志

〔元〕駱天驥 撰

黃永年 點校

三秦出版社

長安史蹟叢刊

主編 魏全瑞

類編長安志

〔元〕

黃駘

點校 撰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 章

三秦出版社

##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類編長安志/(元)駱天驥撰;黃永年點校.一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1

(長安史蹟叢刊/魏全瑞主編)

ISBN 7-80628-800-7

I. 類... II. ①駱... ②黃... III. 長安(歷史地名)一地方志 IV. K294.1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3)第 106130 號

## 書名題籤 成功先生

長安史蹟叢刊  
類編長安志

(元) 駱天驥 撰  
黃永年 點校

出版發行 三秦出版社

新華書店經銷

地址 西安市北大街131號

電話 (029)87205106

郵政編碼 710003

西安永惠印務有限公司

印 刷 本 版 字 版

890×1240 1/32

印 張 數 231千頁

次 版 1100六年一月第一版

印 刷 1100六年一月第一次印刷

印 張 數 1—5000

標準書號 ISBN 7-80628-800-7 / K · 353

定 價 貳拾伍圓整

## 出版說明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爲了全面整理有關古長安的史地文化典籍，著名史學家史念海教授和陝西省古籍整理辦公室提出了編纂出版古長安叢書的設想，史先生任主編，出版事宜則全部交給三秦出版社。經過各方努力，先後推出了隋唐兩京叢考和三輔黃圖校注，受到學界好評。後來由於種種原因，叢書的出版遇到了諸多困難。近來，隨着國家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加之我社綜合實力漸強，我們首先想到的是要把前輩學者開創的這項整理古長安歷史文獻的事業繼續做好。鑑於各方面情況變化較大，我們對原先的計劃作了調整，決定編輯出版一套全新的長安史蹟叢刊，收入類編長安志、西京雜記、兩京新記等十數種歷代撰述，先前已出和將出的三部書也納入叢刊，按照新的要求重新出版。可以說叢書基本包括了有關古代陝西尤其是古長安地域文化的經典作品。叢刊的總序仍然採用史先生原撰總序，一來表示不忘先生開創之功，二來是由於先生的序文高屋建瓴，縱論古今，其中關於古長安史地撰述整理與研究的精辟論述，完全適合長安史蹟叢刊。

# 總序

史念海

長安作爲古都，歷史最爲悠久。長安之名，始於秦時。周的豐鎬即在其西南，秦的咸陽亦位於渭河北岸，雖少有間隔，地理因素大致相若，故言上古的史事，率應視作一體；論都城的建置，亦上溯至於周初。由西周肇始，在這裏建都的有秦、西漢、新、隋、唐等統一的王朝，而東漢的獻帝及西晉的愍帝，也曾在這裏作過較爲短暫的稽留。分裂時期在這裏建都的政權，則有十六國時期的前趙、前秦、後秦和南北朝的西魏、北周。東漢初年，劉玄和赤眉，唐末的黃巢和明末的李自成也均在這裏建立過都城。總起來說，在這裏建都的，先後有六個統一的王朝和十一個政權，共計一千九百九十二年。

都城爲一代人文薈萃之地，有關都城的撰述亦較他處爲豐碩。長安作爲都城，不僅歷年最久，且山川秀麗，物產富饒，處於四塞之內，儼然天府之國，尤爲當時後世所稱道。故有關撰述亦最多。今所知者，殆以辛氏《三秦記》爲最早。辛氏此書不見於隋書《經籍志》及兩唐書《經籍藝文諸志》的著錄，然《三輔黃圖》及《劉昭續漢書》、《郡國志注》、《酈道元水經注》皆有所徵引，而所記又皆秦漢都邑、宮室、苑囿地理，當出於漢時人

士手筆。此後諸家撰述，接踵而起，三輔黃圖兩京新記長安志雍錄皆其著者。

辛氏三秦記綜述都邑宮室，故能巨細兼載，自成一書。而專論一方面的，也早有名家。司馬相如上林賦、揚子雲甘泉賦先後輝映。梁蕭統撰集文選，以上林賦列於畋獵類中，以甘泉賦置於郊祀類內。上林爲規模巨大的苑囿，甘泉於離宮中最負盛名。兩賦對於這樣的苑囿和離宮都作細膩的描述，雖所言不免有誇大不實之處，當時長安附近建築設施的雄偉壯麗，藉此亦略可見其一斑。及班孟堅兩都賦和張平子兩京賦出，更能顯示全豹。所謂兩都兩京，皆係以洛陽與長安相提並論。東漢都洛陽，故賦京都者，不能不有所涉及。其時長安已廢不爲都，而瑰麗却仍不減當年，甚至猶能和洛陽比肩齊聲。

由於長安的山川秀麗，人物薈萃，故四方景慕，咸思瞻仰，是以遠道蒞臨，觀風俗者，時有所聞。甚至王朝更易，都城他移，仍未稍替。其屐履所及，耳聞目濡，往往撰有記述，舊典新章，多能引人人勝。潘岳西征賦殆其著者。安仁爲長安令，由洛陽西行。所記雖多途中聞見，而於長安城中景物，更能不惜筆墨。當其初抵秦郊，觸目所見，「黃壤千里，沃野彌望，華實紛敷，桑麻條暢」。當時長安已淪爲常邑，猶能如此富庶，當年都城的景物，略可想見。

歷來詩人對於都城長安的歌誦，尤多佳句名章。詩三百篇於國風中，列有幽風、秦風和周召二南，然於豐鎬兩京却未多所涉及。不過雅頌諸篇中，有關的吟詠，並非少見。小雅白華：「澆池北流，浸彼稻田」；大雅靈臺：「麀鹿濯濯，白鳥翯翯」，豐鎬城郊的風物歷歷如在目前。唐代詩家歌誦長安，其詩篇的數量和內容，皆能超越前代。後世對於唐長安較之漢長安更爲清晰明瞭，這應是其中的一個重要

原因。

就在長安廢不爲都時，有關的撰述仍陸續見於著錄，可見長安爲世人重視的程度。宋敏求長安志、程大昌雍錄皆撰述於宋代。宋敏求時，長安猶隸於宋朝版圖，而當代建設亦有新績；程大昌時，長安已爲金人所據有，不過前代流風餘韻，並未因之或泯，故此數家著述，得爲當時後世所稱道。

這樣豐碩而又復絢麗的撰述，古長安的往事遺蹟賴以流傳和保存，值得珍視；只是由於傳世已久，間有殘缺散佚，難得全帙；即令幸存於今，由於輾轉鈔錄，魯魚亥豕的訛誤又在所難免。而古今地名複累經改易，舊蹟往往未能確指，致使前賢功績，彷彿輕擲虛牝。如何使之發揮更多更大的作用，這是不容忽視的問題。當前黨和政府組織各方力量整理古籍，允爲一代勝事。古長安叢書也得在這盛世開始編纂，早日克奏膚功，是各方共同的期望。

由於前賢有關著述相當繁多，古長安叢書擬分集編纂，近人撰述亦往往有涉及古長安的，自應一併收錄，俾究心往事者，不必多所問津。初步斟酌，分成五集：

- 甲集、整部撰述，或後世的輯本；
- 乙集、專篇撰述，或由其他著作中節錄的有關篇章；
- 丙集、記遊撰述而未集成專著者；
- 丁集、詩詞歌曲；
- 戊集、近人專著。

如前所說，有關古長安的撰述，由於傳世已久，難免多所訛誤，且刊本較多，間有相互參差之處。故整理時，務須詳加校勘注解，俾使章節句讀的斟酌，字詞義例的闡釋，篇章段落的分析，情緒思想的反映，皆能有所顯現。這都是整理古籍的基本功夫，無容多事贅陳。古長安的有關撰述率多與地理有關。地理時有變遷，古今頗難一致。政區的增損，城池的興廢，鄉聚的分佈，關隘的建置，道路的通塞，疆場的改易，以及河流的移徙，湖泊的湮涸，植被的變化，動物的存沒，有關撰述中是不乏記載的。由於歷年較久，與現今多有違異。雖間有舊說詮釋，却難免舛訛，而輾轉相傳，治絲愈紊，更不易得其真象，前代學人於此，多力於考證，成就斐然可觀，自宜繼踵舊規，期臻完密。而長安古事，有待斠覈者尚復不少，唐代長安城內有都亭驛，長安志謂在敦化坊，徐松、董祐誠皆承其說，而未有所是正，然而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則謂在朱雀街。證以太平御覽所引兩京新記，駱天驥類編長安志及續高僧傳等書，則都亭驛實在朱雀街西通化坊，與敦化坊無關。霸上爲長安城東衝要之地，酈道元水經注既謂其地在白鹿原上，又謂在霸橋東端。後之論者多取前說，間有兼取後說，而未細究其間曲折。然證以晉書，桓溫北伐至霸上時，王猛問他爲什麼長安近在咫尺，而不渡霸水？可證霸上實在霸水之東，並非在白鹿原上。這樣的考證對於解釋古長安的史事是有裨益的。古長安叢書的纂集應該在這方面多所致力。

可是所有考證並非都能了無訛誤。就以霸上而論，其所在雖有兩說，却迥然各異。白鹿原東倚霸水，地勢陡絕，高低相差，頗爲懸殊。桓溫抵達關中時，秦軍已在白鹿原上，循霸佈防，桓溫何能越水而登上原頭？其間道理，至爲明顯，稍一涉足其地，便可豁然洞曉，而一些所謂考證，尚瑣瑣喋喋，徒費筆墨，

令人齒冷。其他事例亦復不少，無煩備舉。以此而論古長安史事，殆難悉其究竟。補苴不足，就必須對地理從事實地考察。以實地考察與文獻考證相對覈，才能確實無誤，而且還應進一步分析說明其變化的前因後果，反映其間的一定規律。

終南山側，峪口連綿不絕。峪中率多皆有溪澗流下，匯而成川，故長安城南多水。居人引水成渠，偏於田塍，水色澄清，倒影如畫，稍加興建，便能引人入勝。唐代永安渠導潏、交之水入城，城南渠上築橋不少。石梁橫懸，即成遊覽勝地。杜甫詩中就曾一再吟詠：『第五橋東流恨水，皇陂岸北結愁亭』，『不識南塘路，今知第五橋』。皇陂即皇子陂。皇子陂中菡萏香溢，亭亭覆蓋。以第五橋和皇子陂媲美，則其地的幽雅可以略見一斑。第五橋何在？張禮在遊城南記中提到：『今第五橋在韋曲西，與沈家橋相近。』說得相當概括，具體所在還得考覈。今西萬公路旁有東西兩第五橋村，第五爲唐代關中大姓，今村中却無姓第五者，是村名當與橋名有關。村之四周不見有橋。原來四十年前這裏僅有一村，並無公路。村之東南積水長存，不能種田。後來，填水修路，又填水建村。今日站在公路上，四面遠眺：公路高於兩側田地，路西兩村略低，路東低窪更甚。到低窪而無積水處掬起一杯土，竟有大半沙粒。顯係渠水流經的地方。第五橋當在此處。更北有沈家橋村，村名亦以橋名。橋在何處？今公路之東約一華里處，一片柳蔭。濃密樹叢之下掩映一段水溝。溝內有水，水爲地面流淌的積水，惟淤泥甚厚。溝岸上有石橋舊址。大石早已移作他用，小石累累，排列平整，向遠延伸，岸形明顯。測量得知，原橋長約五米，寬可過一馬車。橋址在大田之中，與村無路相連。橋旁故老，娓娓敘述，唐時舊蹟，了無疑意。

遊城南記提到兩唐書記載：杜正倫「建言鑿杜固，通水以利人。既鑿，川流如血」。當時，潏河由少陵原朱坡之側，迤邐流向西北至於神禾原畔。如能改變原側高地，當可灌溉更多農田。杜正倫當係因此而建言鑿河引水的。不料施工開鑿，却是川流如血。這自然是雜糅有迷信色彩。究竟如何？自須再作考察。這就要探索唐代潏水的流逕，還須考察杜固的所在。杜固位置，一說在馬崩崖，一說在鳳凰嘴。前者又有二處，一在王莽村近處的原畔、潏河邊，一在潏河源頭南山之下。揆諸地勢和川原形狀，這兩者均不可能。也許鳳凰嘴就是杜固？鳳凰嘴在彰儀村東北，神禾原上。站在少陵原向西遠望，此處正是潏河沿神禾原折西北流的地方。走下少陵原來到樊川，再近到潏河邊仰望，其東、南、北三面突出，超越原外，如同半島。以鳳凰嘴命名，十分形象。從相鄰的北新街村直北的小路可以捷便前往。這條牧羊人日久天長踩踏成的小路，蜿蜒崖畔，再前則無路可行。攀緣崖上高低雜樹，穿林而上，始達其地。這是神禾原邊獨特的地形，絳紅色的土質，雜有紅色更重的小砂，更顯得獨特。所謂川流如血者，殆為紅土紅砂隨波逐流而下，使水流成爲血色。

詩大雅文王有聲篇曾經說過：『豐水東注，維禹之蹟』。可是現在豐水北流入渭，與周時竟不相同。這應不是詩人的誤筆，而是古今有所變化。輞川為唐時王維別業所在，其集中有題詠二十首，久已膾炙人口，而輞川因之亦有名當世。輞川有南垞北垞，王右丞集中南垞絕句：『輕舟南垞去，北垞森難即。隔浦望人家，遙遙不相識』。現在輞川溪水已相當細小，甚至可以徒步涉越，溪中山石礎礎，大者如桌，小者如几，如何還能行船？實地考察並非一望了事，探索其間變化的 reason 和過程，顯然是不可稍事疏忽。

的。這樣一些變化，有人爲的作用，也有自然的因素。涉及自然的因素，就不能不和自然科學有關。這就不是文字考證所可以解決的。

實地考察是應該和文獻記載相結合的。實地考察離開文獻記載，就難得切合實際。文獻記載是有其不足之處的。若非出於第一手史料，就不能說沒有差錯。就是出於第一手史料，也不能說就一定確實。如果不能指出其錯誤的所在，還是不應輕易捨棄的。整理有關長安的古籍，對此是不宜稍事忽略的。長安多古蹟，秦漢時離宮別苑相當繁多，有關載籍也多所記述。甘泉宮和池陽宮都是相當有名的宮殿。秦漢帝王多在甘泉宮決定朝政大計，而且爲直道發軔之所。漢宣帝接見匈奴呼韓邪單于，即由甘泉歸來，宿於池陽宮，以便在長平阪上舉行接見大禮，然後回到長安，再賜盛宴。這是匈奴降附之後，單于的初次入覲，爲少有的盛典。近來有人說於乾縣泔水旁發現甘泉宮遺址，又有人說於三原縣嵯峨山下發現池陽宮遺址。甘泉宮如果在乾縣泔水旁，直道如何能在其地發軔？又如何解釋應劭所說的甘泉宮在雲陽縣西北八十里甘泉山上？嵯峨山下所謂池陽宮，據說距漢長安城七十公里，也就是一百四十華里，則距長平阪亦當有九十里。漢宣帝怎能當天走完這麼遠的路程，並舉行有數萬人參加的接見大典？又如何解釋三輔黃圖所說的池陽宮在池陽南，上原之阪有長平阪，去長安五十里？據說所謂甘泉宮和池陽宮都有瓦當等遺物的發現，這些遺物上雖無文字，却和秦咸陽和漢長安城內的宮殿遺址的瓦當等遺物相同。這些遺物誠然可貴，然未能與文獻記載相互覈實，還是不足取的。長安附近離宮別苑既然很多，瓦當等遺物都應該有所發現，怎能不結合文獻記載，而冒然去確定宮殿？

整理有關長安古籍，可資借鑑和斟酌的，當非少數。前哲舊軌自宜多所遵循，然亦不能墨守成規，先後如出一轍。其間難免有所損益。這裏所不能已於言者，則爲整理之時，如前所云，應作實地考察，山畔水涯，通塗絕徑，舊址遺蹟，斷碣殘碑，皆須親臨究問，得自目驗，再以之與文獻記載相勘證，而後作出相應的論斷。若坐擁書城，不出戶庭，僅以翻檢舊典爲能事，殆不足以言整理有關長安的古籍。當世方家或不至河漢斯言也。

# 前言

黃永年

我應約在一九八一年暑假點校了元人駱天驤的類編長安志。考慮到這是難於見到的秘籍，而傳本脫誤累累，其校勘之不易復迥出尋常古籍之上，把校勘研究之所得擇要寫出，對使用者將不無幫助。

## 一

傳世的幾部宋、元人關於長安古都的專著，以成書時代先後排列是：北宋人宋敏求的長安志二十卷，南宋初人程大昌的雍錄十卷，元人駱天驤的類編長安志十卷，元人李好文的長安志圖三卷。宋志、李圖的宋、元刻單行本雖不存，尚有明成化四年邵陽書堂、嘉靖十一年李經兩種合刻本傳世。儘管所刻較原本已有缺失<sup>①</sup>，而源出明刻的清乾隆四十九年畢沅

靈巖山館校刻本更為易得<sup>①</sup>。雍錄也有明嘉靖時李經刻本和萬曆時吳琯刻古今逸史本，後者較通行且完善。獨類編長安志歷明清兩代至今六百多年，迄未重刻重印，元時原刻固久絕天壤，即傳鈔本也極為稀見。

就著錄來說，除明代皇室的文淵閣書目曾著錄此類編長安志外，明清之際以多藏舊本秘籍著稱的錢謙益的絳雲樓書目裏，錢曾的述古堂書目、也是園書目和讀書敏求記裏，都不曾提到此書。乾隆時開館修四庫全書，廣搜歷代著述，在進呈書目和最後編定的四庫全書總目裏此書也沒有出現。嘉慶時阮元進呈了一批後來賜名為宛委別藏的四庫未收書，在所編撰的四庫未收書提要裏也未收入此書。另外，乾、嘉時的學者曾針對元史之不志藝文作過補志，錢大昕就著有一部補元史藝文志，只要是元人撰述不論存佚統統著錄，而且在著錄時還得到當時大藏書家黃丕烈的幫助，但志中仍未收入此書，可見博洽如錢氏不僅未曾目睹此書，連此書的書名也未聽到過，更不用說學識不逮錢氏的倪燦所撰盧文弨所補補遼金元藝文志了。

正由於此書傳本罕秘，除明清之際葉奕苞編撰金石錄補曾利用過其中石刻類的資料外，有清一代從事長安文獻整理研究撰述的人，如上述乾隆時畢沅校刻宋志、李圖，編撰關中勝蹟圖志<sup>③</sup>，嘉慶時董曾臣纂修長安縣志，陸耀遹、董祐誠<sup>④</sup>纂修咸寧縣志，嘉慶、道光時徐松撰著唐兩京城坊考，以及其後程鴻誥撰著唐兩京城坊考校補記，都不知道利用此書。

清末日本學者足立喜六撰著長安史蹟之研究<sup>(五)</sup>，一九三二年正式出版前曾經他們的東洋史專家桑原隲藏、那波利貞校閱補訂，而此書仍未列入參考文獻。直到一九五六年出版的平岡武夫唐代長安與洛陽地圖編，纔利用了日本靜嘉堂文庫所藏即我國陸氏皕宋樓舊藏的此書傳鈔本，平岡說這個鈔本曾轟動了日本學界<sup>(六)</sup>。在我國，建國以後某些考古機構雖曾早就輾轉傳鈔過此書，並經某些考古工作者零星利用過，但仍沒有人對它作系統的整理研究。

## 二

類編長安志撰著者駱天驥其人，不特元史未爲立傳，即今存元人總集別集中也不見傳狀碑志，因此其生平事蹟只能從類編長安志的本身來探討。

類編長安志有駱氏在元成宗元貞二年丙申（公元一二九六年）所寫的引即自序，以及大德二年戊戌（公元一二九八年）安西路儒學教授賈穀、安西路總管兼府尹王利用的兩篇序。據賈、王序，知駱氏字飛卿；據自序、賈序，知別號藏齋。又據自序所說『家本長安』，王序又稱之爲『長安故家』，知其籍貫長安，且是世居長安的所謂故家舊族。至於其生卒年歲雖無從考實，但從石刻類小序所稱『自幼酷嗜古人書法，石刻僅有存者，不憚涉遠披荆莽而追訪，鈔錄書撰人名暨所在，垂六十年，集成編帙，附長安志後』，知元貞二年纂成類編長安志時至

少已年逾七十，上推其生年尚在金宣宗末年（公元一二二三年前後）。書成之後又繼續增補，石刻類中著錄大德四年（公元一三〇〇年）三月駱氏篆額的大元陝西創建三皇廟碑可證，則駱氏卒年最早亦當在大德四年以後。

駱氏仕官所歷官職，據此書卷前所題銜名只曰京兆路儒學教授。而此書石刻類所著錄駱氏書丹或篆額的碑刻，則不僅有題銜且有年月。即：至元十三年（是元世祖的至元，十三年爲公元一二七六年）正月大元京兆府重修文宣王廟記，題府學教授駱天驥書並篆額；至元十四年（公元一二七七年）皇子安西王盛德之碑，題孟文昌撰，僕散祖奐書，駱天驥篆額，府學諸儒人建；至元十六年（公元一二七九年）正月皇子安西王文廟釋奠記，題京兆路儒學教授孟文昌撰，儒學教授駱天驥隸書並篆額。這裏所題的府學即京兆路總管府的府學，所謂府學教授即京兆路總管府的府學教授，亦即京兆路儒學教授<sup>⑦</sup>。從碑刻所記年月，駱氏之任此職至遲亦當在至元十三年以前。至於離職，我推測即在至元十六年正月書篆釋奠記之後。因爲據元史卷六〇地理志，至元十六年改京兆爲安西路總管府，而類編長安志成書自序在元貞十二年，已後於路名更改十七年，如路名更改後駱氏仍任儒學教授，自應稱安西路儒學教授，而此書卷前銜名却仍曰京兆路儒學教授。同時大德二年王序自署安西路總管而稱駱氏爲京兆教授。賈序自署安西路儒學教授而稱駱氏爲藏齋先生，並說他『辭聲利而遠市朝』，駱氏自序自稱爲藏齋遺老，也都是書成時駱氏久已不任儒學教授現職的口吻。至

於書成後補入的大德四年三月大元陝西創建三皇廟碑之仍題府學教授駱天驤篆額者，當是承用舊時職稱，和此書卷前仍題京兆路儒學教授舊職者相同，而不可能是此時駱氏又重新起用爲安西路儒學教授，否則卷前的題銜也要改用安西路儒學教授，不會仍用京兆路之稱。石刻類中還著錄有大元嘉議大夫提點司天臺張公神道碑，題司天臺判駱天驤書，而未記年月，當在駱氏任儒學教授以前，司天臺判是他早先的官職。

駱氏此書撰成後既乞現任地方職官王利用、賈穀作序，則其刊刻時間從一般情理推測當在作序之後不久，即大德四年或稍後，其時駱氏仍當生存。刊刻地點則很大可能是平陽（今山西臨汾），因爲此書的傳鈔本如南京圖書館所藏丁氏八千卷樓舊藏的傳鈔本和日本靜嘉堂文庫所藏陸氏皕宋樓舊藏的傳鈔本<sup>①</sup>，都是半葉十三行，行二十二字，每卷首尾書名大題作大字占雙行地位，顯係保存了元代原刻的款式。而這種款式在元代只通行於兩個地區的刻本，即北方平陽書坊刻本所謂平水本，和南方建陽（今福建建陽）書坊刻本所謂建本。平陽距離長安近，書成後就近送平陽去刊刻更合乎情理。懂點版本之學的人都知道，平陽是金、元兩代北方的刻書中心，進入明代後却一落千丈，不僅不再有新刻出現，即金、元時舊刻平水本之傳世者也稀如星鳳，遠不能和南方建陽出版業之綿延宋、元、明三朝和建本之廣爲傳布者相比擬<sup>②</sup>，這應該就是駱氏此書元刻本之所以久告失傳、而傳鈔本也極爲稀見的原因。